

评论员观察

要想强身,先要治病。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在进行处罚时,既没有因涉案俱乐部众多就“网开一面”,更没有因有些球员曾是国家队主力而“法外施恩”,而是拿出了“零容忍”的态度向足球的“假赌黑”问题宣战。

整治中国足球“假赌黑”需长效机制

9月10日,对中国足球来说,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。

这天上午,国家体育总局、公安部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专项整治发布会。据官方报道,目前,查实涉嫌假球、赌球比赛120场,涉及中超、中甲、中乙、足协杯、女超等足球联赛,先后涉案的中超、中甲、中乙俱乐部球队共41支,对83名涉案球员、裁判员、教练员、俱乐部管理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,已有44名足球从业人员被依法判决。

评论员 朱文龙

早在2009年,足坛就曾掀起一场反赌扫黑风暴。当时便有不少足球从业者被处罚,中超中甲等不少俱乐部被扣分,两家俱乐部更是被勒令降级。

相对于2009年的行动,相关部门此次对足球“假赌黑”问题的整治,更受舆论的关注。原因在于,如今的中国足球,可谓“一地鸡毛”。从国家队的层面来说,与亚洲强队的差距越来越大。前不久世界杯预选赛上,中国男足耻辱性地以0:7惨败于日本队。至于国内联赛,从罢训、欠薪,到球队解散退出,乱象频出。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们都意识到,中国足球该下猛药救治了!

对足球职业联赛“假赌黑”问题进行专项整治,正是舆论期待的“猛药”。从相关调查情况来看,“假赌黑”对中国足球戕害不浅。中超、中甲、中乙三级联赛竟有41支球队涉案,由此可见,中国足球的行业生态已经恶化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!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些足球从业者走上邪路,成为中国足球发展道路上的“蛀虫”,也就不奇怪了。

要想强身,先要治病。相关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在进行处罚时,既没有因涉案俱乐部众多就“网开一面”,更没有因有些球员曾是国家队主力而“法外施恩”,而是拿出了“零容忍”的态度

向足球的“假赌黑”问题宣战。这样的态度,对中国足球乱象是一种震慑,这样的行动,对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是一种慰藉。

处罚结果的公布,让人振奋,也有网民担心,这样的整治是“一阵风”。网民有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,其实,在“假赌黑”整治行动开始之前,就有俱乐部和球迷就中国足球出现的问题对中国足协提出过批评,但是并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应,许多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,最终导致“假赌黑”乱象的发生。

整治中国足球的“假赌黑”问题,必须建立长效机制,确保整治行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。处罚结果公布后,中国足协负责人表示,“无论是足球从业人员还是俱乐部,只要涉及‘假赌黑’等违法犯罪,必将严肃处理,绝不姑息”。期待中国足协能够说到做到,唯有如此,才能重塑形象,让球迷和投资方重拾信心,推动中国足球尽快走出低谷。

观点

高分考生涌入
高职准备好了吗?

高考540分(物理类)读殡葬专业,602分进职业本科高校……近年来,在全国各地,高分考生迈入高职院校大门的现象越来越常态化。这与前几年大相径庭。教育的价值不应仅由分数和学校的名气衡量,还应关注个人兴趣与就业的契合度。在多元化的教育体系中,每个学生都有权根据兴趣、能力和市场需求,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职业教育不应是“次选”,而是培养社会所需技能型人才的“摇篮”。

实际上,近些年一些高职院校录取分数并不低。以湖南为例,今年119个高职院校专业组达到或超过本科线,数量相比去年的52个高职专业组翻了一倍。毫无疑问,背后主因与就业息息相关。成绩固然喜人,但也要看到,高职院校优秀专业的热门,并不代表整体高职教育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相比,与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,大多数职业院校仍有不少差距。特别是人工智能来临、生源危机初现,高职教育还需保持警醒。

如今,高分考生大量涌入,习惯了接收“低分考生”的高职院校,是否做好了接收高分考生的准备?能否让学生在校园里找到自己想要的未来? 据中国青年报

职场人“两个微信”背后
抵触的是“超长待机”

“上班时用工作号对接工作,下班后用生活号记录生活。”入职季来临,不少年轻人提前准备专用于工作的微信账号,有人甚至嫌切换账号太麻烦,索性准备两部手机,以求在工作和生活间划出一条清晰界限。

在智能手机尚不发达的年代,“八小时”内外相对分离,工作生活各自安好。而如今,一部手机就可随时随地接收任务、处理文档,工作时间也随之延长。不少“打工人”吐槽工作群越建越多,非工作时段也会冒出各种活儿,“上班时间在上班,下班时间还在上班”。随着年轻人隐私意识提升,并不愿意工作圈与生活圈过于重叠。因此,很多人准备一部私人手机休闲娱乐,另一部应对工作,以求在心理层面实现工作生活的“隔离”。

“两个微信”背后,职场人真正抵触的是网络时代的“超长待机”,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碎片式消耗。没谁愿意在几个账号间来回折腾,大家更渴望的,还是上班期间高效工作,下班后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跟空间。而这,个人所能起到的作用恐怕有限,更需要企业自觉厘清工作边界,法律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。 据北京日报

暗含隐性限制条件
优惠券实为“侵权券”

“团购优惠券只能在大厅使用,不能在卡座使用”“代金券是‘夜宵券’,需要到22:00之后才能使用”,近年来在各平台上,不少餐饮商家看到热度流量,顺势推出抵用券、代金券、满减券等不同类型的团购优惠。然而,消费者抢购到优惠券前去消费,却在商家以最终解释权设定的各种隐性限制消费条件面前碰壁,不得不放弃优惠券,这也让消费体验变得憋屈。

餐饮商家在宣传推销优惠券时,不说明或提示消费者注意优惠券的使用范围和限制条件,让消费者以为优惠券可无条件使用,等到持优惠券到店消费时,商家才告知优惠券有消费位置、消费时间等方面的门槛或限制,无疑违背了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,对消费者构成了误导甚至欺诈。

对此,市场监管部门、消协、餐饮行业协会等应联合网络平台,加强监督检查,进一步完善商家的优惠促销规则,拉出优惠促销负面清单,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,规范优惠促销行为,为消费者营造诚信、公平、透明的优惠促销环境。 据北京青年报

来论

一个充电宝870元!“趁灾涨价”当罚

近日,超强台风“摩羯”在海南、广东多地登陆。按照相关部门的建议,市民应减少外出,居家避险,并提前准备好手电筒、充电宝、饮用水、食物等物资。但海口、文昌等城市多名网友发帖吐槽,称电商平台上的充电宝大幅涨价。对此,电商平台客服表示,了解核实此事后,会反映给上级监管部门处理。

从网友曝光的情况看,平时不到一百元的一万毫安规格的充电宝,在台风期间涨价到将近两百元,甚至两万毫安规格的充电宝被挂出了870元的高价。

很明显,这就是典型的“趁灾涨价”行为——商家在特殊时期哄抬价格,想通过涨价牟取暴利,但此举涉嫌违反相关价格法规,扰乱市场秩序,理当依法查处并重罚惩戒。

在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,应急、涉疫物资以及重要民生商品服务价格出现异常波动,可能会对民众生活构成严重影响,甚至可能诱发社会恐慌情绪。

当台风灾害来临,有可能遭遇停电,影响到市民及时接收台风预警信息、了解灾情变化等,因此,人们除了准备食品、饮用水等之外,也要将手机充满电,备好充电宝,以防万一。

可见,充电宝亦属于居民必备的防灾应急物资,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发布建议,提醒居民准备好充电宝的主要原因。然而,部分商家上调充电宝售价,导致不少网友因担心手机断电而被迫购买

高价充电宝。

为维护社会稳定,保障基本民生,各地政府部门都会采取措施管控市场价格。早在9月4日,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发布关于规范台风“摩羯”期间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,提醒告诫各经营者严格明码实价,禁止哄抬价格。对哄抬价格行为,最高可处300万元罚款。

因此,对于此次超强台风期间部分商家的“趁灾涨价”行为,各地应积极回应网友的曝光与投诉,依法依规予以查处,并向社会公开,以警示广大经营者牢记法规,不要再“趁灾涨价”。同时,电商平台也要吸取教训,承担起管理职责,在台风等灾害发生时,针对基本民生物资商品加强价格巡查。 据光明网

骗取2000多万,“小官巨骗”何以致人家破人亡

这是一起令人错愕的“小官巨骗”案。据报道,重庆市大足区万古镇社保所原所长杨皓,以帮助他人办理社保为幌子,骗取190余人共计两千多万元。

“我把钱挪用于购买足彩和赌球,争取把输了的钱赢回来。”下班后,杨皓还在一家彩票店当销售员,也是撑起该店生意的主力顾客。而与他共事的副所长,则骗取70余人共计438万元。

“模式一样,但各干各的”。真可谓蛇鼠一窝。8月15日,大足区法院开庭审理杨皓案,当庭判其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八个月。杨皓未提起上诉。与杨皓共事的万古镇社保所原副所长袁波,因涉及其他案件被逮捕,目前尚未起诉。

而在此前,2023年11月25日清晨,农妇代元贵从重庆一栋居民楼的30层一跃而下——她正是被杨皓所骗的受害者之一。如今,杨皓案虽已宣判,但其真真切切地将人骗至人财两空、家破人亡的教训与叹息,仍将留在万古镇。不得不追问,杨皓何以能常年行骗且得逞?

社保所所长这个公职身份,无疑为杨皓行骗提供了掩护,增加了其行骗的可信度,也赋予了他足够的权威性。据一位

中间人介绍,不论是杨皓的职务、名声,还是他交代的办理社保流程,都让她深信不疑。受害者们也没想到,盖了章的文件竟然也能造假。

在私欲驱动下,杨皓俨然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滥用,成为实施诈骗的重要工具,不仅给村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,也对政府部门公信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伤害。当然,权力的魅惑也使得不少人企图通过“走后门”办理社保,而忽视了法律法规其实早已给权力画上了红线。

由此而言,受害者不仅仅是被杨皓的欺诈所骗,更是法治意识不强,过于迷信权力对法律法规的“突破”功能,这才堕入杨皓用权力构筑起的骗局之中。社保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,但在实践中,一些地方的社保制度却存在漏洞。杨皓案更值得重视的,正是其暴露出的制度漏洞。

社保补缴程序复杂、信息不对称,加上政策透明度不足,使得许多人对社保办理流程一知半解。杨皓正是利用受害者对社保政策的模糊认知,通过伪造文件、虚构劳动关系等手段,制造了所谓“办社保”的假象,从而骗取巨额资金。另

一方面,杨皓能通过伪造材料、调取社保系统信息等手段长期行骗,也反映出相关部门在审核和监管上的不足。

在杨皓案中,村支书和中间人的参与,进一步扩展了这一骗局的影响范围。报道中提到一个细节,部分受害者反映,他们经村支书跟杨皓确认后,才交了钱。在杨皓案中,至少有三位村支书曾向村民推荐过杨皓。这些掌握一定“话语权”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,将亲戚朋友甚至邻居介绍给杨皓。

这种熟人社会中的信任关系,使得诈骗行为更加隐蔽且易于传播。尤其是在农村地区,熟人社会的特点加剧了民众对“权威”人物的依赖,而这种依赖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,往往容易变成腐败滋生的温床,应当予以足够警惕。

杨皓案虽是一桩个案,但也反映出基层治理的某些深层问题。地方政府应扎好制度的篱笆,在加强干部监管和公众政策宣传的同时,切实提高基层治理的透明度与监督力度,避免权力滥用对民众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。 据红星新闻

投稿邮箱:qilupinglun@sina.com